

中国古陶瓷学会 2011 年年会 暨龙泉窑学术研讨会综述

项坤鹏

2011年11月14~19日,“中国古陶瓷学会2011年年会暨龙泉窑学术研讨会”先后在浙江省杭州市和龙泉市举行,会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市人民政府主办,龙泉青瓷博物馆承办,共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法国、英国、瑞士、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组织代表们实地考察了上垟百年龙窑、大窑枫洞岩遗址和溪口瓦窑埕遗址,参观了龙泉青瓷博物馆、披云青瓷文化园和龙泉青瓷宝剑苑。在此次会议中,代表们提交论文43篇,共有29位代表发言,涉及龙泉窑研究的诸多方面,现按论文内容归纳如下:

一 龙泉黑胎青瓷与哥窑

众所周知,在龙泉窑的产品中有一类黑胎青瓷,产品特征与南宋官窑及哥窑产品具有明显的关联性,一直备受关注。长期以来,关于龙泉黑胎青瓷性质的问题,学界争论不断,主要形成了哥窑说、官窑说和仿官窑说三种观点。针对这类产品,2010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在大窑、溪口、小梅等地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此次大会上,关于龙泉黑胎青瓷的探讨成为热点。

龙泉窑黑胎青瓷的特征与哥窑产品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且明陆深《春风堂随笔》以及明郎瑛的《七修类稿续编》等文献中均提到了处州章生一所陶者为哥窑,这更将龙泉黑胎青瓷与哥窑联系在一起。要解决龙泉黑胎青瓷的性质问题,就不可回避哥窑的问题。此次会议上一些学者的发言就主要集中在龙泉黑胎青瓷与哥窑的关系方面。回顾哥窑研究史,有关哥窑的产地、烧造年代以及其属于官窑还是民窑等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以哥窑的产地问题为例,目前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个窑址生产过哥窑瓷器,在文献资料中同样也没有确实的记载能够证明这一点,专家学者们各持己见,总的来说有杭州说、龙泉说和北方地区说这三种观点,在此次研讨会上,有几位代表倾向于龙泉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沈岳明先生、浙江大学的周少华先生和浙江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吴秋华女士均对哥窑的产地做了推断,认为哥窑可能来自龙泉。沈岳明先生在题为《龙泉溪口、小梅出土的黑胎青瓷》的发言中,向与会代表介绍了2010年以来溪口、大窑、小梅等

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所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出土器物特征及科技检测结果，指出龙泉黑胎产品就是明清文献中记载的“宋代哥窑”。同样，周少华先生在题为《“哥窑”研究的反思与拙见》的发言中指出古文献中所描述的哥窑特征与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龙泉黑胎青瓷的特征相吻合，同样认为宋“哥窑”的产地就在浙江龙泉，以龙泉溪口窑址为代表的“黑胎青瓷”便是文献中所记载的章氏哥窑。此外，吴秋华女士在题为《龙泉窑概况》的发言中，结合长期她在龙泉地区的工作实践，指出龙泉是哥窑瓷器的烧造所在地。

关于哥窑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沈岳明先生认为龙泉黑胎青瓷的年代在南宋早期，早于郊坛下官窑，原因有三：第一，他根据安徽新昌绍兴二十九年(1159)墓中出土的墨书“庚戌年元美宅立”“河滨遗范”款葵口出筋碗，断定“河滨遗范”款出筋碗的年代在南宋早期，又根据瓦窑垟Y1遗址中黑胎与“河滨遗范”碗同出，进而提出黑胎青瓷的年代早于或相当于“河滨遗范”碗的年代——南宋早期；第二，他将部分黑胎青瓷进行了热释光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在公元1111—1160年之间；第三，他选取越窑寺龙口窑址南宋窑炉、南宋官窑窑炉和龙泉窑炉的一些窑炉结构进行了对比，认为南宋官窑的窑炉坡度与寺龙口窑址南宋窑炉的坡度截然不同，而与龙泉的窑炉坡度比较相似。同时，沈岳明先生将“传世哥窑”与“哥窑”区分开来，认为“传世哥窑”与“哥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世哥窑的烧造地点可能在龙泉、老虎洞或者景德镇地区。吴秋华女士同样认为存在“哥窑”与“传世哥窑”的不同，哥窑的始烧年代为南宋早期，而“传世哥窑”是历代各地仿龙泉哥窑的“窑变”瓷器。周少华先生则稍有不同，他将“哥窑”区分为“龙泉哥窑”、“传世哥窑”以及“哥哥洞窑”三个不同概念，认为“龙泉章氏哥窑”的烧造年代更早，早到北宋晚期，与河南的汝窑同时期，并大胆推测了“传世哥窑”的性质和产地，即明清时期的“官仿哥窑”，产地为景德镇，同时认为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中的“哥哥洞窑”应为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的“类哥窑”产品，与宋“哥窑”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与南宋官窑存在继承关系。

尽管论证方法有所不同，以上三位学者还是在龙泉黑胎青瓷即宋代哥窑的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在这一点上，上海博物馆的陆明华先生在题为《试述龙泉黑胎青瓷》的发言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将龙泉黑胎青瓷的年代定为南宋早期而排除元代可能性的做法值得商榷，至于将龙泉黑胎青瓷的年代提前至北宋晚期，则基本不可能。陆明华先生认为要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把龙泉瓷片和南宋官窑的瓷片一起进行比较，并进行科学测试，而且对窑炉的演变也要进行全面的研究，把北宋、南宋以及元代窑炉进行科学地排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比较可靠。同样提出质疑的还有上海博物馆的周丽丽女士，她在题为《有关龙泉窑两个问题的再认识》的发言中指出，将2010年以来溪口瓦窑垟窑址考古发掘调查中出土的龙泉黑胎青瓷的年代为南宋早期的观点是颠覆性的，她对沈岳明先生的相关论证方法提出了三点疑问：一，关于“河滨遗范”出筋碗的年代问题。她指出“河滨遗范”出筋碗并不仅存于南宋早期，还可能存在于南宋中晚期及元代，因此龙泉黑胎青瓷与“河滨遗范”出筋碗同出并不足以将其年代提前至南宋早期。二，窑炉结构问题。周丽丽女士主张选取尽量多的窑炉进行排比，排除特例的可能，并且要从北宋开始对龙泉窑的窑炉结构进行分析。第三，是垫具的

问题。在溪口瓦窑埕窑址出土的垫饼里，既有比较粗糙的垫饼，又有非常精细的带圈足的垫饼，对于认为用粗垫饼垫烧龙泉黑胎青瓷时代为南宋早期的说法，她不认同，认为缺少足够确实的证据。

此外，针对传世哥窑的产地为景德镇的说法，陆明华先生指出所谓传世哥窑瓷器包括龙泉黑胎产品、老虎洞窑产品以及宋官窑产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不可能包括景德镇的产品，因为景德镇产品的胎体与传世哥窑截然不同。

综上，随着2010年以来在龙泉溪口等地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进行，出现了一些新线索，有利于进一步拉进龙泉青瓷和哥窑的关系，但是就目前而言，将哥窑的产地直接锁定为龙泉地区以及将哥窑的年代定位于南宋早期，似乎还缺少确凿的证据，也较难令学界形成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次研讨会上，关于龙泉黑胎青瓷与哥窑关系的探讨更加深入，这种探讨对于促进学术进步，解决学术难题无疑是必要的。

二 龙泉青瓷与宫廷官府的关系

历史上，龙泉青瓷曾与宫廷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南宋庄季裕《鸡肋篇》、《大明会典》“窑冶·陶器”、《明实录·宪宗实录》“即位诏”等条都有所记载，龙泉青瓷在南宋皇宫遗址、元大都遗址以及明代南京、北京等皇家遗址中均有出土，此外，在清宫旧藏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龙泉青瓷。这都说明，龙泉青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进入宫廷，为宫廷服务。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明代早期地层中出土了一批产品特征与清宫旧藏龙泉瓷极为相似的残片，重新掀起了学界对龙泉青瓷与宫廷官府的关系等相关问题讨论的热潮。

关于龙泉大窑枫洞岩的窑场性质问题及其相关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此次研讨会上，南开大学的刘毅先生在题为《从龙泉窑考古资料看〈大明会典〉记载的瓷器烧造》的发言中，分析了龙泉窑效力于明代宫廷的年代，即起始时间不晚于洪武二十六年，下限最晚是在天顺末或者成化初年，至于枫洞岩窑址是否为官窑，他结合枫洞岩遗址情况以及相关文献记载进行了分析，认为枫洞岩遗址所表现出的生产性质与景德镇窑场有明显的不同，枫洞岩窑址可能是明初一处很重要的生产贡御瓷器的窑场，但不应该是正式的官窑。周丽丽女士同样也涉及了这一问题，她从大窑枫洞岩遗址出土的带“官”字款的标本入手，认为这种刻“官”款的作法承袭唐、五代及北宋遗风，而其窑场性质则应该为贡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徐军先生在题为《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器》的发言中没有过多地涉及窑场性质的问题，他将这部分特征明显的龙泉早期青瓷称为官用青瓷，并将其分为洪武时期官器和永乐时期官器，同时对其用途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些器物不是供应给尚膳监的御器，而是供应给光禄寺使用的可能具有祭祀、宴享和赏赐功能的官器。

厘清清宫旧藏龙泉青瓷器有利于研究龙泉青瓷与宫廷的关系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不同时代的龙泉青瓷共1600余件，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一定数量的收藏，文献方面，

清宫历朝《陈设档》以及《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等在不同程度上对这批瓷器的有所涉及，此后也多有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对其著文介绍，故宫博物院的赵聪月女士和黄卫文先生分别在《从故宫旧藏宋代龙泉青瓷解读清代宫廷对龙泉窑的认识》以及《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研究》的发言中，对清宫旧藏宋代和明代的龙泉青瓷器进行了介绍与探析。赵聪月女士介绍了25件宋代龙泉青瓷的形制以及原藏位置，并结合《乾隆御制诗集》探讨了乾隆皇帝对宋代龙泉青瓷的认识等问题。与之相似，黄卫文先生在211件明代龙泉青瓷中选取了一些典型器物进行介绍，并结合文献，通过分析对比指出，部分清宫旧藏明代龙泉青瓷极有可能来自龙泉大窑枫洞岩，而且前朝遗存的龙泉宫廷用瓷不仅在清代仍在普遍作为宫廷陈设或祭礼器使用，而且其中还有部分藏品是明代进宫后就一直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存放在一起的。

此外，2008年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淮城镇河下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明代龙泉窑瓷片堆积，关于该堆积坑的性质问题，在此次研讨会上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南京博物院的霍华女士在题为《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坑》的发言中，对该堆积坑出土的龙泉瓷片进行了介绍，判断其为一处一次性倾倒的二次堆积坑，堆积年代是天顺八年至成化初年，堆积坑中的瓷片，多数为一般商品，少量是为进贡皇宫而生产的官器。由位于今淮安市楚州区的板闸钞关拣选进京，霍华女士推断这些官窑废品是在执行明成化皇帝于天顺八年正月发布的《即位诏》时，所令诏书到日“烧完者照数起解”的御旨而被设坑掩埋的。刘毅先生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该堆积坑里的龙泉青瓷片有人工打碎的迹象，还有与大窑枫洞岩窑址官器同类的碗和盘等，因而他推测这批龙泉青瓷是在南京及其附近烧造的遗存，成品、次品一起清运，是表示一种烧造制度的终结。

毫无疑问，龙泉青瓷在宫廷官府用瓷中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006年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明早期地层中所出土的龙泉青瓷残片与清宫旧藏明龙泉青瓷在特征上具有极高的一致性，这解决了部分清宫旧藏龙泉青瓷的产地问题，但是是否能认定枫洞岩窑址的性质就是官窑，目前尚缺少足够的证据，北京大学教授权奎山先生对官窑有如下的定义：1.有自己的作坊，有相应的管理机构；2.朝廷派官或者委托地方官进行管理；3.烧造经费有中央财政负责解决；4.烧造产品供给宫廷和中央相关部门使用调配，如果以此为标准，认为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的性质为官窑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另外，关于淮安关楚州区淮城镇河下遗址出土的部分具有官器特征的明代龙泉窑瓷片，极有可能是龙泉窑在贡御漕运过程中在淮安关拣选后的废弃物，在清代督陶官唐英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详细地提到景德镇烧造的瓷器运至淮安关拣选，而清代御窑厂制度承袭明代而来，由此反推，再结合这批出土瓷片的相关特征，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三 龙泉青瓷对外输出相关问题探讨

龙泉青瓷的对外输出，许多文献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曾数次提到当时我

国商人以“处州瓷”与海外各国进行交易。不仅有文献记载，随着国内外考古工作的进行，在国内的港口遗址、沉船遗址以及国外的沉船遗址和其他遗址中都出土(水)了大量的龙泉青瓷。关于龙泉青瓷的对外输出，目前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其输出的路线、涉及的国家 and 地区、不同时期的特点以及工艺传播和影响等。

相关国内外出土(水)的资料，对于我们研究龙泉青瓷的对外输出来说非常重要。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栗建安先生在题为《我国沉船遗址中出水的龙泉青瓷》的发言中，介绍了福建平潭大练岛西南屿沉船遗址、福建漳州龙海半洋礁沉船文物点、广东阳江“南海一号”沉船遗址等沉船遗址中出水的龙泉青瓷的情况；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的德雷克·康耐特等在题为《近东地区考古遗址发现的龙泉窑瓷器——英国威廉姆森藏品及斯拉夫遗址调查藏品中的龙泉窑青瓷简介》的文章中，对伊朗南部和波斯湾北岸等一些近东地区的遗址中的龙泉窑青瓷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宁波博物馆的李军女士在题为《元代庆元港与龙泉窑青瓷外销》的发言中，介绍了宁波元代市舶遗址考古出土的龙泉青瓷情况；新加坡的林亦秋先生在题为《寻找龙牙门——印尼宋元明龙泉青瓷的行踪》的发言中，介绍了部分在印尼发现的龙泉青瓷；上海博物馆的陈洁女士在题为《明代中期龙泉青瓷外销初探》的文章中，介绍了她所收集的部分沉船出水 and 海外出土的明代中期龙泉青瓷的资料。

关于龙泉青瓷对外输出的路线，以下几位学者都有涉及。栗建安先生根据沉船遗址等线索，勾勒了龙泉青瓷的贸易路线：浙江龙泉窑址——福建平潭——福建漳州——广东阳江——海南西沙群岛——南中国海——东南亚——西亚——东非，并着重分析了龙泉青瓷从窑址到海上的路线，即龙泉青瓷的一部分从窑址经过一段陆路，自邻县(福建浦城等)进入闽江上游，然后顺流而下出闽江口到海上。除了栗建安先生外，李军女士对元代庆元港输出龙泉青瓷的路线作了简要论述；林亦秋先生对龙泉青瓷对外贸易的地点之一——汪大渊《岛夷志略》等文献中记载的“龙牙门”进行了考证，指出其并非新加坡，而是印尼的凌牙门地区。

龙泉青瓷的外输在我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许多学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之一，此次研讨会对此方面问题的探讨多集中在资料介绍方面，另外关于输出路线、输出网络、阶段特点等问题也有所涉及。

四 龙泉窑制瓷工艺的影响

在较长一段历史时间内，龙泉窑产品都具有很高的质量，因而其制瓷工艺对国内许多地区的窑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随着龙泉青瓷的对外输出，其制瓷技术也传至国外，在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伊朗、土耳其和埃及等国的陶瓷产品中都可以见到龙泉青瓷的影子。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余家栋先生在题为《江西仿龙泉与浙江龙泉青瓷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文章中，对江西地区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宋元明时期龙泉青瓷及仿龙泉青瓷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

探讨了浙江龙泉青瓷与江西仿龙泉青瓷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由于龙泉青瓷深受青睐，江西景德镇湖田窑、珠山龙珠阁御窑、吉州永和窑和临江窑均竞相仿烧。此外，广东省博物馆的黄静女士、厦门市博物馆的彭维斌先生等，分别谈到了龙泉青瓷对广东、福建等地窑址陶瓷业生产的影响。龙泉窑影响不仅仅限于国内，而且还辐射到国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解放日报集团的程庸先生在题为《亚洲诸国仿龙泉窑青瓷简述》的文章中简要叙述了龙泉青瓷对朝鲜、日本以及埃及等国制瓷业的影响。

龙泉窑与江西地区各窑址在制瓷工艺方面的相互关系一直被大家所关注，余家栋先生的发言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龙泉青瓷对国外的制瓷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受困于国内外相关资料的隔绝，许多专家学者在涉及到此问题时，多是蜻蜓点水，缺乏翔实的论述，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充分论证依然值得期待。

五 馆藏及出土（水）龙泉青瓷的介绍及相关研究

龙泉青瓷质量精美，影响广泛，其踪迹遍及国内外很多地区，许多博物馆都收藏有龙泉青瓷。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水）了大量的龙泉青瓷器。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浙江、北京、河北、河南、陕西、江苏、重庆、广西、广东、台湾、福建诸省市及英国、新加坡等国的学者分别介绍了各地馆藏和出土（水）的龙泉窑瓷器，几乎涉及国内大多数省、市、区及东南亚、西亚、东非、欧美等地区，为学界对龙泉青瓷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比如，馆藏方面，黄卫文先生、赵聪月女士、冯素阁女士、舒佩琪女士以及小林仁先生等分别对北京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台北鸿禧美术馆以及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等博物馆收藏的龙泉窑产品进行了介绍与探析；考古资料方面，河北省文物出境鉴定中心的穆青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王小蒙女士、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陈丽琼女士等分别对河北、陕西以及长江三峡地区出土的龙泉青瓷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总体来说，任世龙先生在题为《论龙泉窑的时空框架和文化结构》发言中对龙泉窑的概括非常全面，他指出：龙泉窑既是大江南北两大瓷窑业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型范例，也是宋代“官窑”和“民窑”不同文化层次既相互关联又互相激荡的产物。此次研讨会为我们研究龙泉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一、着重地介绍与发表了关于龙泉窑的新的考古资料，深化了人们对龙泉窑的认识；二、多视角地对龙泉窑进行研讨，代表们涉及的问题包括龙泉窑的创烧年代、窑业性质、生产方式、制作技术、装烧工艺、艺术风格、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以及与其他窑场的相互影响等方面，讨论全面，论证充分；三、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龙泉窑的研究，并将龙泉窑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张 露）